

崢嶸歷程



回 忆 录



二〇〇五年十月

目 录

我的少年时代.....	(2)
在难童中学的成长过程.....	(4)
走上抗日斗争第一线.....	(9)
与胡肇汉的残酷斗争	(11)
胡肇汉杀害我革命同志	(13)
奔袭人民死敌胡肇汉	(17)
与日寇的初次交锋	(18)
生死关头鱼水情	(20)
南进开辟任、石新区.....	(23)
沉着应对解险情	(25)
张天雄英雄献身	(27)
随部队开赴阳澄	(28)
叛徒出卖,敌伪偷袭.....	(30)
陈鹤同志宁死不屈	(32)
打退忠救军入侵	(34)
放弃“苏常太”,转入“澄锡虞”.....	(36)
接关系恢复地下党组织	(38)
颜益民同志惨遭杀害	(41)
积极开展党的活动	(43)
到中央苏中党校学习	(44)
下江南运送军火到西漳	(45)

组建中共江阴特区工委	(47)
回无锡接受新的工作任务	(49)
恢复乙种党组织的活动	(50)
遇险情多位同志蒙难	(54)
调正干部以加强党的领导	(56)
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	(58)
发展和壮大党的队伍	(60)
开展反抽丁、征粮和收税的斗争.....	(62)
开展锄奸工作	(65)
通过地下信箱与武工队加强联系	(67)
为确保安全四易立足点	(68)
调任澄锡虞工委组织部副部长	(70)
千方百计克服经济困难	(72)
打入并控制新藤乡伪政权	(74)
严家桥地下党控伪取得胜利	(77)
策动仁爱镇伪自卫团起义	(79)
做好迎接大军渡江的准备工作	(83)
在包厚昌指导下迎接大军渡江	(87)

难忘的岁月

——回忆解放前参加革命斗争的经历

也许有人会说：“往事如云烟，一切去远了，淡漠了，何必再去追思它，回味它！”然而，这对于我来说，全然不是如此。这是因为，在我的一生经历中，有许多往事是不会忘怀的。特别是在解放前，有着我青少年时期接受革命启蒙教育所走过的曲折而又坎坷的道路；有着抗日救亡斗争时期所经受的火与血的洗礼；有着解放战争时期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吃尽千辛万苦，历尽千难万险，遇到过多少次生与死的考验。所有这些，尽管岁月沧桑，寒暑更替，事情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却仍然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使我每—想起，便会心潮起伏，激情难平。

目前，我们祖国的面貌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在一日千里般地向前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恰如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天更比一天好。越是在这种时候，我就越是忘不掉解放前的那一段往事，我觉得在昨天到今天这一天翻地覆的变化中，似乎在揭示着一个真理，那就是：没有昨天，哪来今天；了解昨天，更要珍惜今天。这就是我所以要把半个世纪前的一段往事记录下来，的初衷。

我的少年时代

1919年12月6日，我出生在无锡市堰桥镇龙泾头自然村的一户农民家里。父亲名叫沈福宝，字凤翔，母亲倪根娣。他们共生养我和大妹妹沈彩林（为平，毓琪）、二妹沈玉英等三人。我家共种7亩地，其中2亩是租田。我父亲除了种田之外，还是一名小有名气的厨师，前村后巷的人家，凡有婚丧喜庆等需要置办筵席，都要请我父亲去当厨掌勺。母亲在料理家务之余，还搞摇袜、织布等副业生产，就是我在放学回家后，还要帮着母亲缝袜底。由于一家人克勤克俭，遇到丰收年成，生活过得比较宽裕。

我9岁那年（1927年）进入胡氏小学读书，15岁小学毕业后入胡氏初中。我小时候学习很勤奋。从我家去学校，要走过河岸上的狭小泥路，越过一顶摇摇晃晃的木板桥——安桥，平时一不小心就会失足落水，遇到刮风下雨路更难走，过桥更危险。可是，我坚持天天到校，从未因故旷过课。晚上，在我母亲织布机旁的煤油灯下，复习功课，完成一天的作业。

在我读初三的那年，有二件事情在我幼小的心上，烙上了很深的印象。一件事是傅作义将军率部在大青山英雄抗击日寇的入侵，博得全国人民的热烈赞扬。语文老师要我们以此为题写一篇作文。我在这篇作文中，突出地写了在大青山战斗中牺牲的烈士；这些无名英雄们为保卫民族独立，抵抗日寇侵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颂扬他们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我在这篇作文中，初次显露了爱民族、爱国家的思想倾向。第二件事是无锡县新文化协会来学校开展推广新文化活动。我和邱福康等一部分同学参加了新文化的学习和研究（邱福康同学后来参加了新四军，在黄桥战斗中牺牲了）。学校领导对推广新文化活动百般阻挠，对参加这一活动的同志，以开除学籍来威胁。教“公民”的老师马德良，甚至气势汹汹地在课堂上

说我是共产党。其实,当时我对共产党,既无直接接触,也毫无认识。倒是由于马老师一句污蔑我的话,刺痛了我的心,使“共产党”这三个字,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们龙泾头这个自然村落,是个绝大多数农户种地主租田的贫农村,只有一家富农。农民们一年忙到头,所得到的菲薄收入还不够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年关将临,收租、讨债的纷纷上门。许多农户在交了租、还了债以后,已经所剩无几;有的旧债未还清,新债又缠身;还有的农民甚至被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逼上了绝路。我亲眼所见,我家的邻居殷仁清和后底巷沈阿泉的父亲,为生活所迫,抛下了妻儿亲人,一个投河自寻了短见,一个悬梁而离开了人世,情状惨不甚睹。我反复地思考:为什么农民手爬天、脚爬地的一年忙到头,生活还是过得这样苦?为什么有的农民会走上轻生的道路呢?在我的内心里,深深埋下了对贫苦农民的同情心,萌生着还处在朦胧状态的阶级感情,由此种下了我走上革命道路的种子。

1937年7月,我初中毕业于胡氏中学。就在这一年的8月13日,日寇侵占了上海,接着便长驱直入,苏州、无锡相继沦陷,我们全家曾乘着叔父沈林培的米船,逃到前洲附近的甘棵头去避难。在日伪统治时期,农村中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土匪队伍。我们附近的旺房村有个阿黑麻子,收集了国民党军队溃退时丢下的枪枝弹药,拉起了一支队伍。这些土匪队伍,敲榨勒索,打家劫舍,横行乡里,每到夜晚,枪声四起,鸡犬不宁。农民人家特别是富有的人家,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惟恐遭到土匪的抢劫,不仅要破财,甚至还要把命搭上。父母为了避免我被土匪绑票,便送我去上海,寄居在伯父沈纪培家。就在这时候,我有缘经邻居小朋友就读学校的一位姓孙的老师介绍下,就读于上海市国际第一难民收容所办的难童中学,并接受了最初的革命启蒙教育,迈开了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步。

在难童中学的成长过程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践踏了上海，奸淫烧杀，无恶不作。人们为了免遭日寇蹂躏之苦，大批拥入了租界避难。上海国际慈善救济会，便在马斯南路震旦大学的操场上，搭起了八个难民棚，建立了上海国际第一难民收容所，前后共收容了男女老幼4万多难民。翌年春，为了使难民中失学的青少年能够继续读书，又搭了二个难民棚，便把他们集中起来，办起了难民中学。当时，初中三个班级共有学生120多人。1938年的春夏之交，我拿着孙老师的介绍信，来到上海国际第一难民收容所，找到了所长潘达。潘所长看了介绍信面有难色地说：“我们这里只有初中，你已初中毕业了，不能收留你了。”这时，恰逢舍监徐世祥在旁，他上下打量着我，接过潘所长手上的介绍信看了一下说：“介绍信上不是写明予以收容和到难民中学读书吗？就收下吧！”就这样把我领到了他的办公室，对我说：“你真已初中毕业，可以把功课再复习复习，可以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事后才知道，潘达和徐世祥都是共产党员，特别是徐世祥同志，是一位无限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优秀党员，也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老师和引路人。

1938年9月，难民中学建立了“少年先锋队”，团下面按班级建立了三个大队，由我担任团长之职并兼任第一大队长。建立这个给织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把难民中学的青少年组织起来，通过加强教育和学习，不断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在此民族危亡之际，培养他们逐步成为抗日救国的先锋。为此，我们经常组织他们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等著作，教唱卖报歌、大路歌等进步歌曲。在难民中学，同学们的的生活是很艰苦的。住的是草棚，吃的是杂粮，有不少同学由于缺水，不能经常换洗衣服和洗澡，身上生了疥疮，长满了白蚤。为了帮助解决难民中学的经费困

难，我们还组织同志成立了纸花生产小组，把卖纸花挣得的钱，来弥补学校经费之不足。尽管同学们的生活十分艰苦，但情绪却十分高涨。他们在日寇侵华的炮火下聚集在一起，深知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为了救国大业，大家都精神愉快地进行着工作与学习。

经过一个时期学生工作的锻炼，徐世祥同志介绍我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难民自救会”，并担任了小组长。我们经常到王亚雄老师家去开会，因为她父亲开着蛋厂，是掩护我们从事革命活动的良好场所。每次开会制订一个阶段的工作计划，然后分头工作，到下次聚会时汇报，再修正计划，部署下一阶段的工作。我们从工作中得到锻炼，使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不断提高。

从此以后，徐世祥同志对我加强了党的教育，他先与我讲什么是共产党？什么人能参加共产员？接着讲共产党员要遵守党章，服从党纲，党的利益和国家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共产党员要不怕坐牢，不怕牺牲。他还教我们唱《囚徒歌》，“铁窗和镣铐，锁得住我们的身，锁不住革命精神”的歌词，唱出了共产党员的不怕坐牢的大无畏精神。我深深地为这种精神所感染，不时地唱着《囚徒歌》，甚至到了耄耋暮年，还常唱着它。徐世祥同志还教育我，对党要忠诚老实，只有全体党员忠诚于党，共产党才能成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才能去打倒日本侵略者，才能去胜利地完成解放全中国的光荣任务，才能去最终完成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

1939年3月，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展开了崭新的一页。我经党组织的考验和审查，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徐世祥和俞学显两位同志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在震旦大学的操场一角，为我举行了庄严的入党宣誓仪式。从此，我下决心坚定不移地走革命的道路，当一名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革命战士。

难中的校长徐巽华是国民党员。他为了争取同学，特地选派了一位名叫皮念祖的人进入初一班活动。

上海地下党组织也为了加强在难民和难中同学中的政治工作，特地从上海市女青年会调来了张梦莹、张素云、俞丽芳和应玉英等四位同志来难民收容所。她们的分工是：张梦莹和张素云协助徐世祥同志搞好难中工作，俞、应两位同志在难民中开展活动。出于工作需要，难民中学很快便建立了党小组，由我担任党小组长，组员有张素云、殷慕苏、乐菊仙等同志，从此，我们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展了一场与国民党争夺青少年的激烈斗争。

由于我在难中担任了“少年先锋团”团长的公开职务，经常带领学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所以，我在学生中的威信较高，同学们都亲切地称呼我“老大哥”。正因为这，在争夺青少年的斗争中，我便成为国民党的注目人物，校长徐巽华首先在我身上下了功夫。先是用“调虎离山计”，想把我撵出难民中学，一天，徐校长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他热情地接待着我，和霭可亲地对我说：“你现在已学完了无线电原理和无线电收发，我准备介绍你去上海无线电器厂工作，可以发挥你的才能。”我思索了一下回答说：“谢谢徐校长的栽培，可是，我的学业还未全面完成，这样离开难中，岂不是半途而废吗？”我婉言谢绝了。事后，我向党组织作了汇报，徐世祥同志说：“你做得对。今后，不管是威胁还是利诱，都不能上当。你是共产党员，应经得起考验。”徐校长一计不成，又来一计。一天，一位漂亮的广东女同学，突然约我到公园相会。我与这位女同学素无来往，平时彼此之间连话都没有说过，现在突然相约，我感到奇怪，我将这一情况向徐世祥同志作了汇报。他说：“这怕是‘美人计’吧！你可以去，看她玩什么花样？但要提高警惕。”第二天，我在一位男同学的陪同下，到公园与那位女同学见面，见面之后，相互打了个招呼，我便向她讲了一通抗日救国的道理。她觉着话不投机，又见另一位男同学陪着，没有说什么，不一会就告别走了。国民党使出的新招法，又遭到了失败。

在难民中学，我们与国民党的斗争，集中表现在“死读书”和

“反死读书”上面，实质上是青少年应不应该参加到抗日斗争中去的问题。学校领导提倡的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只要求同学们学好各门功课，不谈国家大事，也不必去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例如，语文老师郎德三就只向学生教读一篇又一篇的古文，要求熟读，并能背诵，使同学们埋首在古书堆中，脱离了抗日斗争的现实。我们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相机进行了一场“反死读书”的斗争。我们发动学生选派代表去见校长徐巽华，要求改进教育内容。我们提出，既要选读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古文，如读文天祥、史可法的文章等，还要选读具有先进革命思想的今文，如读毛泽东主席的著作等。徐校长开始不答应，代表们就与他反复说理。后来，在强烈的政治攻势下，他才被逼勉强地答应了同学们的要求。我们在“反死读书”的斗争上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从此，我们名正言顺地组织同学们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和《论持久战》等文章。各班级的同学通过分组学习，边学边议，大大提高了爱国主义思想，这就为日后动员同学们奔赴抗日斗争的第一线奠定了思想基础。

1939年7月，由国民党把持的学校领导眼看着难中的青少年抗日思想日益高涨，而且越来越靠近共产党，便使出一条“釜底抽薪”的计策，拟在学期考试结束之后，宣布放长假让学生回家，名为放长假，实为解散学校，妄图达到“我要不着，你也别想要”的可耻目的。我们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率领全体同学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反对解散学校”的斗争。首先，我们向同学们揭穿了学校当局的阴谋，接着提出：“我们要学习，不要解散，学校若放假要我们回家，我们就罢考。”同学们紧紧地团结在我们的周围，一致拒绝考试。学校当局束手无策，被逼收回了成命，这一场斗争又取得了胜利。但是，在这以后不久，学校当局又采取了新的花招，他们将难民中学并入了上海市慈愿收容所的慈联职业中学，并设立了纠察大队，严格控制学生的出入和所谓的不轨行动，难中两派政治势力的斗争，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是年8月，徐世祥同志与中共东路特委组织部张英部长取得了联系。根据革命的需要，学校党支部动员了12名思想进步的同学，由我带领到苏、常、太游击根据地去。从此，我们离开了难民中学，去接受党组织交给我们的新的工作任务。

我在难民中学的这一段经历，时间虽短，感受深刻，终生难忘。难中是我成长的革命摇篮，难中是我走向革命道路的起点站。在我之后，有许多难民和难中同学，在党组织的教育和动员下，分批到浦东、苏常太和浙、皖等地参加了新四军。慈联职业中学（也包括并入的难民中学），不仅为江抗、新四军输送了抗日力量，也培养了不少干部，为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贡献。

走上抗日斗争第一线

我离开了难民中学，带领 12 名同学准备乘长江航轮去根据地。谁知，那时正值“八一三”前夕，上海的交通一片混乱，长江全面停航了，我们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既暂时去不成根据地，也不能贸然返回学校。这是因为，我们这些人早已被学校领导所注目，如果回校有可能发生危险。但不回校又到那里去存身呢？这时，我想起了在上海内河轮船公司工作的叔父沈纪培，我找到了他，请求帮助解决住宿难题。经他的介绍，我们在停靠码头的货轮上暂且栖身。我们的行动引起了警察的注意，他们时常上船来察看动静。对此，我们商量了一个对策，警察来时便唱起了无聊的小调，玩起了纸牌，就这样把警察蒙蔽过去了。几天以后，长江通航了，我们便搭乘长江航轮溯江而上，在十二圩港又换乘了内河轮船到达了荡口。这时，中共东路特委组织部的张英部长已在码头等候我们了。我们又一起乘上了小棚船，到达了中共苏州县委的所在地——太平桥。县委的办公地点设在门前有一棵高大银杏树的大庙里。张英同志把我们带领到这里，我们都填写了登记表，办理了正式加入革命队伍的手续，等候着分配工作，我们到达太平桥不久，徐世祥同志也来到了这里，更名为徐克强。在分配工作时，十二名同学都分配去江抗部队增加抗日武装力量，只有我一个人被留在太平桥搞民运工作，从此，我正式走上了抗日斗争的第一线。

民运工作的主要内容是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发动群众参与到抗日斗争中来。我住在王巷的一个伪保长家里。白天跟农民一起下地干活，与群众打成一片，一面作社会调查，一面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晚上，我们还在湖边的一座庙里办起了农民夜校，教他们识字。我们自编了油印的识字读本，既进行文化教育，又结合进行抗日救国的思想教育。为了活跃情绪，我们还教唱了“大刀

进行曲”等抗日歌曲。当时，国民党的乡、保、甲组织依然存在，不能废除，只能利用，于是，我们便组建了一种半政权性的组织——自卫会，作为建立人民政权前一种过渡形式。有了这个组织，我们便适时地进行了壮丁训练，动员更多的农民参加区自卫队、县常备队以及江南抗日义勇军，从而不断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力量。

在王巷这个村子里，潘汉臣、钮嘉林都是贫苦农民，他们有革命的自觉要求，正义感较强，我便主动地去接近他们，经常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把抗日救国的道理以及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什么人能参加共产党等道理讲给他们听。经过一段时间考验，在思想觉悟得到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发展他们参加了共产党，同时，上海地下党也不断派同志到根据地来，其中有杨子清、周斌、钟延龄、浦清、吴魁、马尼、白桦等同志，这就使民运工作的队伍，得到逐步发展和不断壮大。

与胡肇汉的残酷斗争

胡肇汉，是活动在澄锡虞交界的张家浜周围地区的一股地方武装的头目。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们曾与他作过长期的针锋相对的残酷斗争。京剧《沙家浜》，就是用文艺的形式部分反映了这一斗争的史实。

1939年3月，上海地下党组织根据党中央“一致对外，团结抗日”的统战精神，派遣翁迪民（以后更名为宫岳）带领六位同志来到太平桥，任务是把胡肇汉部争取改造成在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他们去胡肇汉部以后，做了一番争取工作，并着手对部队进行改造和整顿，命名为“苏北（指苏州以北）抗日义勇军”，成立了总指挥部，胡肇汉任总指挥，陆步青任副总指挥，宫岳任政治部主任兼总指挥部秘书长。在此同时，在部队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每个中队（约100人）设政治指导员，加强对官兵的政治思想工作，并通过薪饷改革，缩小官兵之间待遇的差距，为官的日薪30元，当兵的每月也能拿到薪饷15元。至此，胡肇汉这股危害一方百姓的土匪武装，暂时改变成为接受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

在改编以后不久的1939年5月，胡肇汉籍口日本鬼子要来扫荡，将部队拉到路南敌伪据点附近隐蔽起来，丢下宫岳带领的政治部同志及一部分武装，留守在渭泾塘附近，遭到敌伪军的包围袭击，受到严重损失。宫岳突围出来，率部回到太平桥，这时，宫岳误以为胡肇汉在路南已经投敌，心里非常气愤，而且把这种错误估计告诉了受胡肇汉派遣前来太平桥了解情况的钱中队长。不料，胡肇汉也随即率部回到了太平桥，听了钱中队长的告密，大为恼火，立即收缴了宫岳同志的手枪，并把他毒打了一顿，交警卫看管起来，被软禁在洋沟楼。直到是年6月21日端午节那天，叶飞同志派周醒民同志送信给胡肇汉，要他把宫岳放回，宫岳才脱离了困境，搭

上周醒民同志的船，回到了“江抗”二路副司令员吴克刚（吴焜）同志处。这时宫岳被软禁在洋沟楼已近一个月了，由于宫岳同志在工作中的轻率之举，激怒了胡肇汉，以致没有能够圆满地完成党交给他的统战任务。

经过这一波折，胡肇汉与我们产生了矛盾，但是，争取胡肇汉抗日的工作仍在继续进行。1939年夏，随着叶飞同志率领的新四军六团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的名义东进至张家港地区，再次将胡肇汉部改编为“江抗”独立第一支队，任命胡肇汉为司令，新四军六团副参谋长周达明同志任副司令，并命胡部随“江抗”东进。胡肇汉表面接受改编，其实心怀鬼胎，他对他的部队被“江抗”带走十分恼火，自己非但不随军东进，还多次派人去策动东进的旧部开小差返回。与此同时，他又在当地招收散兵游勇，收缴民间藏枪，不久又拉起了一支队伍。敌伪顽看准胡肇汉一心只想当独霸一方的“草头王”，所谓抗日，不过是掩人耳目的一个幌子。于是，便乘机挑拨离间，以名誉地位进行拉拢。敌伪当局把胡部收编为“江苏省保安一团”，任命胡肇汉为团长，胡肇汉在名利双收的引诱下，终于走向了反动。

胡肇汉杀害我革命同志

胡肇汉投靠敌伪这一举动，引起我们的警惕，不得不采取一些应变措施。中共苏州县委从太平桥撤到东塘市，在胡部辖区搞民营工作的同志，撤回湘城一带，一部分同志转入地下。我被派遣到渭泾塘黄泥浜，以一个当地人亲戚的身份住了下来。不久，我又接到中共苏州县委的通知，要我撤到湘城施家堆，与吕品生等同志一起，学习联共党史。在这以后，我被调到中共横泾区委任宣传委员，继续搞民运工作。

1940年4月，我党为尽最大努力争取胡肇汉，有关领导直接与胡肇汉谈判，晓以大义，阐明得失，严肃指出他投靠敌伪的错误，改过自新，弃暗投明，是他唯一的出路。胡肇汉表面上表示不与人民为敌，假惺惺地说他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并且同意我们派民运工作同志进入湘西地区，开展活动。于是，我们便抓紧时间，立即抽调了一批同志，组成了湘涇工作队，先集中在一起搞宣传工作，然后分配到湘城、涇泾各个大村子去搞民运工作。时值插秧季节，我们便跟群众一起下地干活，有的拔秧，有的运秧、插秧，与群众打成一片。我们一面与群众一起劳动，一面向群众宣传我党的日救国主张，热火朝天地展开了工作。共产党的新四军在群众中的威信不断提高。

胡肇汉见此情况，由于他本质反动，认为群众都跟共产党走，这对自己是大不利，更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心中十分恼怒。1940年夏，他终于撕破面纱，公开露出了狰狞的反动面目，接二连三地破坏地下党组织，杀害我革命同志。下面，简要地记叙四位同志的被害经过。

刀砍沈菊英。沈菊英同志是我党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一名优秀交通联络员，她的家是最可靠的交通站。沈菊英同志热爱共产党，